

文化交流与社会创新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第6卷 第8期 总第59期

2025.08



第6卷 第8期 总第59期

文化交流与社会创新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出版社信息

主管：香港星源出版社

主办单位：香港星源出版社

主编：沈格瀚

执行主编：傅瑾遥

社内编辑：

邵予恬 汤梓寅 冯予深 金承煊

潘芷珺 邹景澄 林珞昕 方致远

沈仪 黎宸赫 温瑜 贺清然

霍芮瑄 方梓琪 隋瀚文 顾思瑜

庄婧彤

网址：<https://hksspub.com/>

电话：+852 6855 8145

邮箱：hksspub2022@163.com

刊期：月刊

STAR SOURCE PUBLISHING
香港星源出版社



3367 9822

目 录 CONTENTS

叙事型节目中主持人的情境引导策略与受众沉浸机制研究	阮柏天 001
跨媒体环境下新闻主持的语篇结构调整与受众信任建构	宋芊洛 007
沉浸式音频节目中主持人声音引导的情绪共鸣机制研究	郝楠昕 013
主持人访谈策略中的追问技术：结构、节奏与互动秩序	梁以珩 019
数字时代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在文化交流中的应用与伦理研究	康博仲 025
娱乐节目主持的叙事节奏设计与观众参与感形成机制	傅承曜 030
生成式语音技术赋能新闻主持的可控表达模型与应用边界	杜芷澜 037
体育赛事主持的实时语言决策机制及表达精准度评估	林曜晨 043
直播带货场景中主持人的说服力表达策略与用户信任模型	赵苒兮 049
播音主持专业训练中的语音感知系统开发与实践路径	方景尧 055
主持人在社会议题报道中的价值立场表达与中立性调节策略	沈祉安 061
广播主持的语言简化机制及其信息传递效能研究	江晗睿 067
影视解说类主持的语言压缩模式与二次传播影响研究	钱以辰 073
主持人口播广告的节奏控制策略与商业效果评估	莫瑶珊 079
公共文化节目主持的审美表达机制与情境化叙事研究	梁承清 085
跨文化采访中主持人的语言切换策略与文化敏感性分析	霍景越 091
AI 辅助脚本生成对主持人内容创构能力的影响研究	任瑾禾 097
多语种主持的语音平衡策略与国际传播有效性研究	郭承励 103
短视频平台中主持人的表演性语言风格与注意力吸引机制	徐芮琛 109
播音主持语言规范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演变与应用趋势	蓝意辰 115

数字时代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在文化交流中的应用与伦理研究

康 博 仲
(浙江 浙江大学 310058)

摘要:

人工智能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快速发展,使声音传播在数字化语境中呈现出技术智能化与文化符号化的双重特征。本文以 AI 语音传播为核心议题,探讨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传播机制、社会影响与伦理边界。研究基于传播学、声音文化与媒介伦理等理论框架,结合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对智能语音的媒介结构、文化功能及潜在风险进行系统阐述。

结果表明, AI 语音通过语音合成、情感模拟与算法调控等方式,改变了传统传播模式,重构了人与媒介的关系,使声音成为跨文化互动的重要媒介形式。虚拟主持在数字平台中承担了信息传递、情感连接与文化表达的多重功能,推动了“人机共声”的传播格局。同时, AI 语音传播也引发身份真实性模糊、算法偏见与文化趋同等伦理问题,对传播规范与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关键词: AI 语音传播; 虚拟主持; 文化交流; 传播创新; 媒介伦理

一、引言: AI 语音与传播变革的时代背景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出现,标志着数字传播进入以智能声音为媒介的阶段。语音合成、自然语言生成和虚拟形象建模等技术的发展,使声音成为人工智能与文化传播交汇的重要载体。AI 语音通过情感化语调与拟人化叙事方式,重塑了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也推动了传播生态从“人声表达”向“人机共声”转变。

在中国的媒介环境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等机构已陆续推出 AI 主持形象,如“新小微”“小白”“新小冰”等。这些智能传播者能够持续输出信息,适应多语种与多平台传播需求,为文化内容的扩散提供了新形式。然而,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应用同时引发真实性、算法偏见及媒介伦理等问题。例如,虚拟声音是否仍然代表人类传播主体? 算法驱动是否会削弱新闻真实性或造成文化刻板印象? 这些问题表明, AI 语音传播不仅是一项技术革新,更是文化传播结构的深层变动。

本文聚焦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机制与伦理边界,探讨智能声音如何影响传播关系与社会文化认知,从而揭示其在当代数字传播体系中的作用与挑战。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框架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 AI 语音传播的媒介逻辑与文化价值,理解虚拟主持在多元文化传播中的功能

转变,并阐释其所引发的伦理议题。研究将传播学、声音文化与媒介伦理作为理论基础,结合智能传播与人机传播的相关视角,构建技术、文化与伦理三重分析框架。

本文以文献分析、文本解读与案例研究为主要手段,结合 AI 语音传播的典型实践案例(如央视 AI 主持与新华社 AI 播报)展开分析。通过对其传播特征、受众互动与伦理争议的综合考察,尝试揭示智能声音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机制及社会意义。

1.3 研究创新与结构安排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视角与结构的融合。论文将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视为文化传播的主体,而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尝试从声音文化与传播伦理的交叉角度分析其社会影响。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阐述研究背景、方法与创新思路;第二章分析 AI 语音传播的文化逻辑与价值框架;第三章梳理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发展脉络及传播机制;第四章探讨数字声音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第五章讨论智能语音传播的伦理挑战与社会治理;第六章提出智能声音时代的传播共生与文化愿景,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AI 语音传播的文化逻辑与价值框架

2.1 智能传播的媒介结构与语音特征

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声音成为数字传播系统中最具生命力的符号形式。与传统广播语音相比, AI 语音的生成方式不再依赖人类发声,而是通

过算法建模和语料训练生成情感化语言。这一媒介结构的转变,使声音传播从“自然再现”迈向“算法生成”,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新的语义与认知机制。

AI 语音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可编程性与可塑性。它能够根据语境需求实时调整语速、语调与情绪色彩,实现针对不同受众的多层次传播体验。AI 语音不再是单向的传声工具,而成为承载文化意义与社会情感的媒介。其传播形态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双重融合,即技术逻辑主导内容生成的同时,文化逻辑塑造了声音的意义系统。

智能语音传播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所建立的“拟声真实感”。当语音系统通过深度学习再现人类语音特征时,听众往往在感知层面将其视为“自然的声音”,从而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2.2 技术拟人化与声音文化的社会意义

AI 语音的拟人化过程,是技术与文化交织的社会现象。通过模仿人类声音特征,AI 系统赋予虚拟传播者以情绪表达与人格特征,使其能够以“类人身份”参与传播活动。虚拟主持、AI 播音员和智能语音助手的普及,使声音不再只是信息载体,而成为具有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3]。

这一“技术拟人化”现象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扩展了传播主体的边界,使人机之间的传播关系呈现出“协同共存”的特征。AI 语音能够在不同语境下展现情感、礼貌与逻辑判断,从而模糊了人机角色的界限。其次,AI 语音的社会功能体现为“情感连接”,在文化内容生产中强化了受众的情绪共鸣。智能语音新闻、播客以及虚拟主持节目中的温和语态与情感叙事,使声音成为构建社会情感认同的重要手段[4]。

AI 语音的文化影响还表现在跨文化传播中。多语种合成与本地化语音技术,使文化内容能够以更自然、更亲和的方式被不同语言社群接受。声音的拟人化与情感化,使文化传播摆脱了文字障碍,形成了以声音为核心的“听觉文化交流”模式。这种基于技术的文化共鸣,正在推动传播从内容输出走向价值共建。

2.3 传播伦理在数字语境中的重构

AI 语音传播的扩张,也带来了伦理范畴的重新定义。传统传播伦理强调信息真实性、传播者责任与受众尊重,而在数字传播环境中,这些原则正面临算法决策与技术替代性的挑战。AI 语音合成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削弱传播主体的可识别性,造成身份虚拟化与责任模糊化的问题[2]。

在智能传播体系中,伦理问题的核心不再是“是否真实”,而是“谁来承担传播责任”。当AI声音

参与新闻播报、舆论引导或文化叙事时,其内容往往由算法生成或编辑介入,传播者责任的边界变得模糊。技术开发者、平台机构与使用者之间的责任分配,成为媒介伦理讨论的新焦点。

另一方面,算法偏见与声音刻板印象也是伦理重构的重要议题。语音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可能带入性别与文化偏差,使AI声音在传播中复制社会不平等现象。传播伦理的更新,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修正,更需要文化层面的反思——即如何在追求效率与智能化的同时,保持对多样性、真实性与人文尊严的尊重。

传播伦理的重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自我修复。AI 语音的社会应用迫使传播体系重新审视“声音”这一媒介的价值边界,从而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反思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只有在尊重文化差异与传播责任的前提下,AI 语音传播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文化交流与社会信任的正向力量。

三、AI 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发展脉络

3.1 智能语音技术的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语音识别到语义生成的系统化转变。早期的语音传播主要依赖录音与人声播报,而现代AI语音则通过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模型实现了“拟人化”语音生成。从文本转语音(TTS)技术的突破,到情感语音合成、语义理解及多模态交互的实现,声音传播已进入“智能生成”阶段。尤其在自然语言处理(NLP)与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支持下,AI语音系统能够识别语义意图、模拟语气情感,实现更接近人类表达的传播体验[1]。

技术的持续进化使语音传播实现了从“机械模仿”到“情感参与”的跃升,使声音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具备自主生成与学习的能力。与此同时,AI语音传播的社会功能不断拓展,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教育、广告、播客与文化创意等领域,构建出新的传播场景。

3.2 虚拟主持的传播形态变化

与AI语音技术的发展相伴,虚拟主持作为新型传播主体,正在重塑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虚拟主持人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主持,他们以数字形象与AI语音算法为核心,结合语音合成、动作捕捉与视觉渲染等技术实现拟人化表演。这一传播形态的最大特征在于“具身传播”——声音与形象的协同,使虚拟主持具备情感表现与社会互动的双重能力[3]。

在中国媒介体系中,AI虚拟主持的应用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AI小白”,新华社的“新小微”,以及地方媒体的智能播音系统,均展示了虚拟主持在信息传播中的应用潜力。这些主

持人不仅承担新闻播报任务，也在文化节目、教育传播及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与传统主持相比，AI 主持人可实现全天候播报、语种自动切换与风格自适应，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持续方案。

虚拟主持的发展还推动了传播内容的交互化与情感化。算法可根据受众反馈调整语言与语调，形成动态传播机制。受众的互动行为成为虚拟主持持续优化的重要数据来源，进一步强化了传播的个性化与精确性。

3.3 人机传播关系的再定义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的发展，使传统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众”关系被重新构建。智能传播主体的出现，使信息生产、内容表达与意义生成呈现出“算法协同化”特征。人机传播关系的核心转变在于：人类不再完全掌握传播控制权，算法在内容选择与语义生成中的主导地位，促使传播行为具有了技术共创的特征 [1]。

这种关系的变化同时带来了文化层面的反思。一方面，人机协作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展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半径；另一方面，算法驱动的传播机制也可能削弱传播的主体性，使传播活动在技术逻辑中趋于标准化。虚拟主持在执行传播任务时虽具“人格化”外表，但其情感表达与价值取向依然由程序设定。这意味着，AI 语音传播的“人性化”更多是一种符号模拟，而非真正的情感体验。

未来的人机传播关系可能呈现出“共生—协商”的形态。人类传播者与 AI 系统的互动将更加频繁，传播过程也将更加动态与开放。如何在智能传播中保持人文温度与文化多样性，将成为 AI 语音传播发展的关键议题。

四、数字声音的文化传播实践

4.1 智能语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AI 语音技术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体现了数字传播从信息技术向文化技术的转化。随着语音合成、语义识别与自动翻译技术的成熟，智能语音已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AI 语音系统通过多语种合成和语调本地化处理，使文化内容能够以更自然的方式适应不同语言环境。例如，在国际新闻播报与文化节目中，AI 主持可依据目标受众的语种与文化习惯进行声音再建构，从而增强文化信息的理解度与亲和力。

语音系统在生成内容时，往往融入节奏、韵律和语气变化等文化符号，使听觉传播具有情感层次。声音的跨文化适配不仅缩短了语言距离，也重构了文化理解路径。

4.2 虚拟主持的传播功能与受众接受

虚拟主持的传播实践，是 AI 语音与视觉形象融合的集中体现。与传统主持人相比，虚拟主持通过语音合成与动态表情实现“拟人传播”，在视觉呈现和情感表达上更加灵活。虚拟主持既是技术产物，也是文化符号，其存在本身承载着未来媒介的形象想象。

受众对虚拟主持的接受程度与文化心理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观众对 AI 主持的信任感与“人类相似度”呈正相关关系，当虚拟形象具备真实语音与自然动作时，受众更容易形成认同感。在文化传播场景中，虚拟主持往往以中立、亲和的形象参与公共传播，其声音特征被视为“理性与情感的平衡体”。这种传播策略在教育、文化展示和公益传播等领域尤为突出。

然而，部分观众对 AI 虚拟主持持谨慎态度，认为其情感表达缺乏“人性深度”。这种心理反应提示了文化传播中的伦理边界：技术虽能模拟人声，却难以完全复制人类经验的情感厚度。

4.3 人机共声的传播模式与媒介表现

在数字传播环境中，AI 语音与人类主持的共存已成为主流趋势。人类主持通过语音引导内容情感，AI 语音则在算法逻辑中实现扩展与协同，二者共同参与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这一模式的价值在于：它在保持信息准确性的同时，提升了传播的速度与多样性 [4]。

媒介表现层面，人机共声强化了传播的层次性。人声提供情感深度与文化温度，AI 语音则承担数据化、标准化的传播任务。例如，在国际多语种播报中，AI 语音可自动转译新闻文本，而人类主持则负责文化背景与语义补充。二者形成互补关系，使传播过程既具有智能效率，又保留文化温度。

4.4 声音技术对文化交流的启示

声音是文化的基础符号，而 AI 语音技术的普及，使声音重新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数字时代，声音不再仅仅承载语言信息，更被赋予情感、审美与文化认同的功能。AI 语音的可塑性为多元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使声音成为跨文化理解与社会共情的桥梁。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AI 语音技术促使传播重心从“信息传递”转向“意义共建”。声音的情感表达、语气节奏和语调变化，使文化内容在传播中具有温度与感染力。声音技术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再现方式，也激发了新的传播伦理思考：技术能否表达真实情感？合成声音是否代表文化立场？这些问题构成了未来文化传播亟待回应的议题 [2]。

五、智能语音传播的伦理挑战与社会反思

5.1 声音拟真与身份真实性问题

AI 语音传播的最大伦理挑战之一在于“声音拟真”所带来的身份真实性危机。随着语音合成技术的发展，AI 系统可以高度还原人类声音的语调、节奏和情感特征，使虚拟声音与真人声音几乎无差别。

当听众无法区分 AI 与人类发声时，传播的“真实性”概念受到冲击。声音曾被视为人格与情感的延伸，是人类传播中的信任象征。在算法生成的语境中，声音成为一种可被编辑、复制与操控的媒介符号，其背后可能并无真实的主体存在。这种虚拟声音在传播公共信息或情感内容时，可能误导受众的认知，甚至被用于操控舆论与制造虚假内容。

身份虚拟化还引发传播责任的不确定性。当 AI 主持人以特定“人格”播报信息时，受众的信任往往建立在对其“拟人形象”的情感认同上。传播者身份的模糊化使伦理责任的归属变得复杂——开发者、机构与用户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声音拟真技术在带来传播创新的同时，也促使社会重新审视“声音背后的人”这一问题。

5.2 算法决策与文化偏见的风险

AI 语音系统的运行依赖于算法与数据模型，而算法本身并非中立。它在语音生成、语义分析和情感建模过程中，可能带入开发者的价值倾向与文化偏见。尤其在语料训练阶段，数据的来源、比例和标签选择，都可能影响 AI 语音的文化立场与表达风格 [3]。

例如，在语音合成中，女性声音常被设定为“温柔”“顺从”，男性声音则更偏向“权威”“理性”。这种性别化的声音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再现了社会刻板印象，使 AI 传播成为文化偏见的再生产工具。此外，语料来源若集中于单一文化语境，AI 语音的表达可能忽视其他文化群体的语义特征，导致传播的文化同质化。

算法决策带来的风险还体现在“语义引导”层面。AI 主持人在生成内容时，算法会根据关键词和语境自动选择表达方式，而这些选择未必符合人类传播伦理。例如，在报道敏感事件或多元议题时，算法可能出于效率优先而简化或规避复杂的社会语义，造成信息偏向。长远来看，这种“算法过滤”将影响公众对现实的认知结构，削弱传播的公共理性。

应对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算法透明机制和伦理审查制度。传播机构与技术开发者应共同承担责任，对 AI 语音生成的语料来源、价值导向与语言输出进行动态监测，以减少文化偏见的隐性放大效应。

5.3 虚拟传播者的社会责任边界

虚拟主持与 AI 传播主体的普及，使传播责任从

个体伦理转向系统治理。传统传播者承担信息准确性与价值导向的伦理责任，而 AI 传播者的行为结果往往是技术设计与算法驱动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下，社会责任的边界变得模糊，传播行为的后果需要在多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划分。

虚拟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受众的情感责任、对内容的真实性责任以及对社会的文化责任。情感责任意味着 AI 语音在模拟人类情感时，必须遵循传播诚实原则，避免以虚拟情感误导受众。真实性责任则要求 AI 传播内容的生成过程具备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防止语音生成被滥用于伪造信息或操控舆论。文化责任则强调 AI 传播者应尊重文化差异，避免以技术标准取代文化表达的多样性 [4]。

为实现这些责任，需建立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技术层面，应完善算法审计和身份认证机制，确保虚拟声音在传播中的可识别性；制度层面，应通过法规明确 AI 传播行为的责任归属；文化层面，应通过教育与舆论监督，引导公众形成理性认知，理解 AI 语音传播的技术属性与伦理边界。只有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下，AI 传播者的责任体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使技术创新与伦理秩序相互促进。

智能语音传播的伦理挑战，实质上是数字传播体系对“人文主体”的再考验。随着 AI 语音在新闻、教育与文化传播中的深入应用，如何在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实现平衡，将成为衡量未来智能传播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六、声音的未来与人机共生的传播伦理

6.1 智能声音的社会传播意义

在数字时代，声音已从单纯的信息载体转化为构建社会联系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AI 语音的兴起，使声音传播具有了超越生理边界的可能。通过算法生成、情感建模与语义模拟，智能声音不仅能模仿人类表达，还能在传播实践中形成独立的文化符号体系 [1]。

智能声音的社会意义在于重塑传播权力结构。传统传播体系依赖媒体机构的集中生产，而 AI 语音的开放性与可复制性，使普通用户也能参与内容创造。声音生产的门槛降低，信息的表达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6.2 人机共生的伦理启示

AI 语音与虚拟主持的普及，使人机传播关系从“替代”走向“共生”。人类与智能系统的关系正在经历从操作对象到共创主体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演进的结果，更是伦理思维的更新。人机共生的

传播结构要求社会重新界定“传播主体”的含义——当机器参与意义生成时，传播活动不再是单向的人类行为，而是由技术、算法与人类共同构成的多层互动系统 [3]。

这种共生关系带来了新的伦理启示。其一，传播伦理的核心不再仅仅是“行为规范”，而是“关系治理”。人机协同传播的本质是一种动态协商的过程，需要通过透明算法、责任追溯和人文审视来维系信任。其二，智能传播要求伦理框架具备前瞻性。技术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制度更新，伦理反思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构建，形成能适应技术演化的社会共识。其三，人机共生传播的目标应从效率追求转向价值平衡。AI 语音不应仅服务于传播速度或商业利益，而应在文化多样性与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均衡 [4]。

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人机共生的传播伦理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表达”权的再理解。当技术能够发声、传播并影响社会认知时，人类不再是唯一的聲音拥有者。如何确保技术的声音不掩盖人的声音，成为智能传播时代伦理建设的核心问题。

6.3 声音文化的未来走向

随着 AI 语音技术的持续进步，声音文化正进入一个智能化与多维化并存的阶段。未来的声音传播将不再局限于语言输出，而是通过语音、图像、情感与数据的融合，构建全感官、多模态的传播生态。这一趋势意味着声音不只是媒介内容的形式，更是文化意

义生成的动力。AI 声音将成为连接技术与人文的重要通道，为文化传承与社会创新提供新的可能。

随着语音合成与虚拟传播的广泛应用，文化真实性与审美多样性可能面临被算法标准化的风险。若 AI 声音被资本逻辑主导，其表达方式可能趋于模式化，削弱声音背后的个体性与文化差异性。为此，未来的声音文化建设应强调“技术治理”与“文化自觉”的结合，在规范中保障创造，在创新中保持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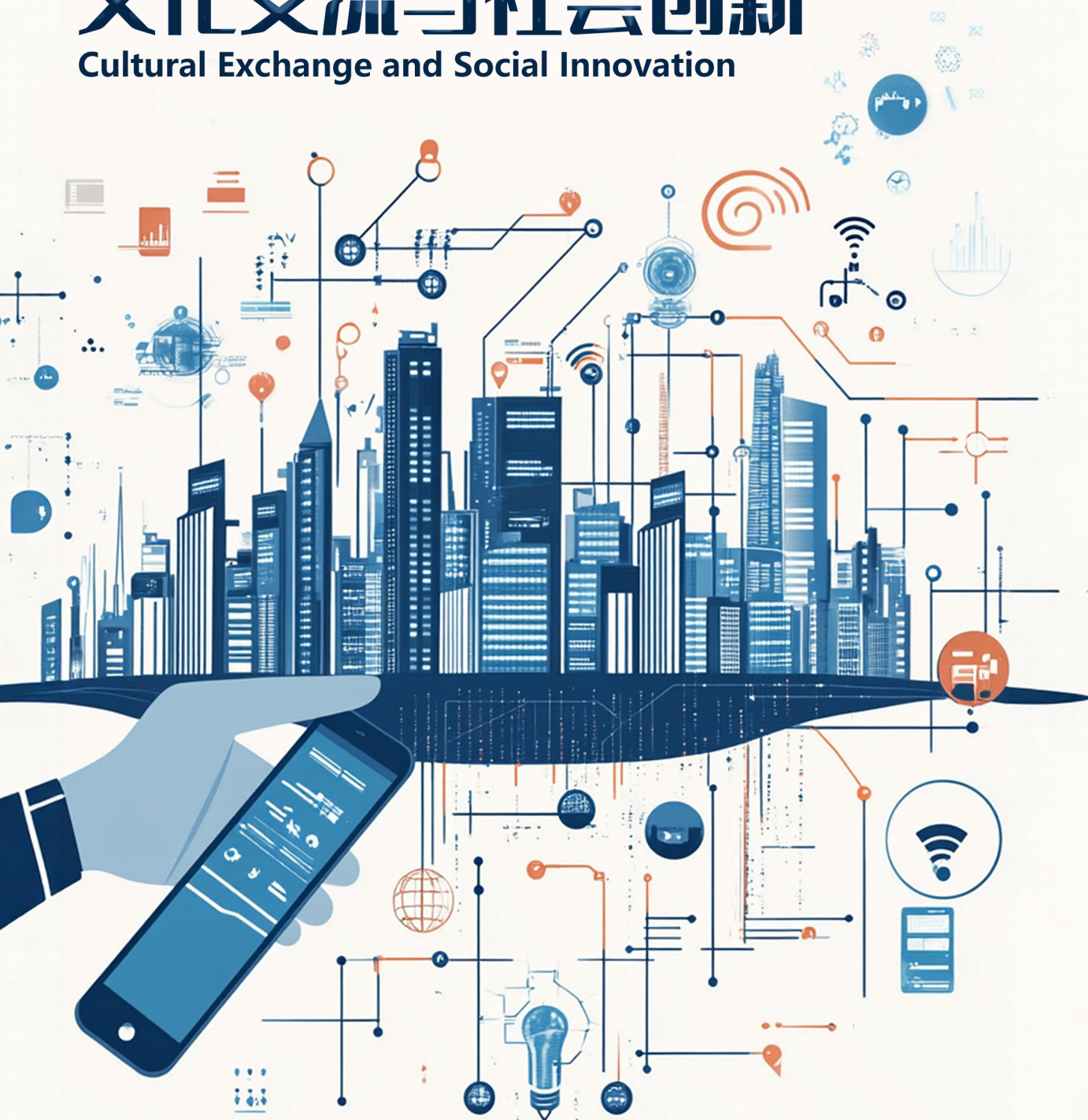
从社会层面看，AI 声音将成为公共传播的重要力量。它可以服务于教育普及、文化传播与社会关怀，也能在多语言、多文化交流中促进理解与共情。智能声音的未来，是技术、人文与伦理共同塑造的未来，是“被听见”与“被理解”并重的文化共生过程。

参考文献：

- [1] 盛厚华.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审视——智媒时代下 AI 主播的价值与伦理辨析 [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3): 541-546.
- [2] 杨勇, 刘泽, 李怡歌, 王雨. 智媒时代人工智能虚拟主播的媒介伦理及治理路径——以“微软小冰”为案例 [J]. 现代视听, 2023(5): 25-29.
- [3] 元昊. 智媒时代下 AI 主播在新闻播音中的发展创新探析 [J]. 传播力研究, 2020, 16: 92-93.
- [4] 邵鹏, 杨禹. AI 虚拟主播与主持人具身传播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0(6): 71-74.

文化交流与社会创新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3367 9822